

创新合作：“一带一路”下香港的功能定位与转型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程玉鸿 朱 颖

[提 要] 本文对“创新合作：‘一带一路’下香港的功能定位与转型暨庆祝香港回归 20 周年”学术研讨会的主要观点进行了梳理和总结。与会学者围绕“一带一路”背景下香港发展的机遇、挑战与动力，香港发展的定位与角色，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建设与发展和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产业合作等主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和交流，分享了香港与内地学者关于香港发展的最新思考与观点。

[关键词] 香港 一带一路 粤港澳大湾区 一国两制

[中图分类号] F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687 (2017) 03-0086-07

2017 年适逢香港回归祖国 20 周年。作为微型经济体的香港，回归以来虽历经国际经济环境动荡的冲击，但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香港与内地合作不断深化，经济社会持续繁荣稳定，始终保持着自由港特色和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地位，连续多年被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和最具竞争力的地区之一，彰显了香港的发展成就和“一国两制”实践的巨大成功。同时，20 年来，随着内地改革开放日益深化，经济快速发展，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和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香港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已发生了深刻变化。在此背景下，“创新合作：‘一带一路’下香港的功能定位与转型暨庆祝香港回归 20 周年”学术研讨会于 6 月 11 日在暨南大学召开。来自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中国社会科学院、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浸会大学、香港“一国两制”研究中心、香港中国商会、澳门经济学会、中山大学、暨南大学、上海大学、广东省社科院、《中国工业经济》《经济学动态》《新华文摘》《港澳研究》、

*本文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基于城市群网络演化的城市竞争力评价及其变动机理研究”(71673113)、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城市网络视角的城市竞争力变动与城市群一体化演进耦合机理研究”(12YJA790017)、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城市群协调发展视角的城市竞争力变动机理研究”(GD11CYJ03)、经纬粤港澳经济研究中心以及广东产业发展与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合作研究中心联合资助。

利丰发展中国有限公司等内地与港澳著名高校、研究机构、期刊编辑部和企业的 100 多位政界、学界和商界代表与嘉宾参加了会议。

会议邀请香港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与设计系讲座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叶嘉安，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鹏飞，中国银行（香港）经济及政策研究主管谢国樑和暨南大学特区港澳经济研究所所长钟韵等做大会主题报告。在其后的各分论坛上，参会学者分别围绕香港发展的机遇、挑战与动力，香港发展的定位与角色和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构建、发展与产业合作等议题展开研讨，分享了最新研究成果和学术观点。

一、香港发展的机遇、挑战与动力

香港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与设计系讲座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叶嘉安在“香港在全球经济空间转移下的挑战与机遇”主题报告中指出，由于珠三角和内地其他城市生产性服务业迅速发展，香港与内地“前店后厂”的合作模式受到严峻挑战，并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逐渐衰落。对此，他提出了“前台后室”的新区域合作模式，即香港的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在内地设“前台”开辟市场，香港则作为“后室”提供生产性服务，为内地庞大的经济体系服务。香港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时间较长，加之拥有自由的市场经济环境和国际视野，享有“一国两制”政策的便利，使得香港在新的合作模式下仍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港澳研究所研究员蔡赤萌在回顾香港回归 20 年来经济发展特点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香港发展面临的挑战。她认为香港回归以来，经济发展经历了几次危机调整，波动较大，走势和外围周期调整高度关联。外需对香港经济的拉动力逐渐趋弱，内需产生的内生动力不足以弥补外需下降带来的影响，导致经济走势总体呈现逐步下降的趋势。回归以来，受国际产业分工变化，以及内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主动对接国际规则，对外开放由试点向全面逐步扩大，“走出去”战略实施加快的影响，香港作为一个以中介功能为生存空间的经济体，其作为以往国家唯一的对外窗口的功能有所改变，尤其是以“一带一路”倡议、内地自贸区试点为典型代表的国家开放战略新局面形成之后，香港在新的背景下需要扮演一些新的功能，但这些功能有些是香港以往挖掘的不够或者正在面临挑战的。从发展阶段看，香港已经进入高收入阶段，受自身经济结构的局限，增长动力不足，原来高速发展掩盖下的结构性动力问题正逐渐显露，社会问题也正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上的困难。香港虽作为全球城市，但功能上并不全面。香港的金融类、专业服务类功能较强，但竞争力新核心要素的培育与集聚比较困难。因此，向知识型高增值方向转型时面临不少困难。此外，推动经济社会转型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政府进行战略引导、建立配套的制度和政策、协调社会利益、凝聚社会共识。但是，在目前香港的政治生态环境中，这方面会面临许多困难。她认为，未来香港需要在高度发达的全球商业网络中发挥其节点功能，由经济活动的统筹者、协调者、引发者和策划者，进一步向产业链的高端延伸。同时，香港还面临高端制造业优势缺失和传统功能无法延伸和拓展的挑战，在重整资源、调整高端服务能力方面面临新挑战。在施政方面，香港特区政府则面临着拓展增长动力、促进就业机会、完善公平竞争、缓和两极分化、保障民生、协调不同利益诉求等诸多挑战。

暨南大学经济学院特区港澳经济研究所教授覃成林则主要从“一带一路”的视角阐释了香港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他认为，机遇方面主要包括“一带一路”为香港提供新的发展空间、广阔的经贸合作领域、多样化的“走出去”需求等。而在挑战方面，主要是内地开放总体格局变化

将动摇香港的“中介”地位；内地自贸试验区建设将削弱香港的自由港优势，导致内地对香港服务业需求的相对减少；内地相关城市受益于“一带一路”建设而加快发展，将对香港赖以立足的优势产业产生日益增大的竞争压力。另外，香港参与“一带一路”还存在着不少劣势，包括香港现阶段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切入点不多；在与“一带一路”沿线非英语国家和地区开展经济联系时所遇到的难题并不会比内地少；香港社会目前出现的“经济问题泛政治化”现象以及“港独”现象极有可能导致香港失去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先机。覃成林认为在“一带一路”背景下，香港的经济发展新动力，一是来自于既有的金融服务业、专业服务及其他工商业支援服务业的发展，二是来自于文化、创意、医疗、教育等新兴产业。香港要培育经济发展新动力，应采取三方面应对策略。第一，香港特区政府需要积极作为，主动嵌入内地建设“一带一路”的各种网络，尤其是要积极开拓非英语国家和地区的市场，通过创新服务模式，提高产业发展竞争力。第二，转变与内地的经济关系模式，主动嵌入内地的发展网络，推动与内地市场的相互开放，实现要素流动自由化，促进香港产业发展方式的创新。第三，香港特区政府、企业和居民需要认清内地和世界发展的大趋势，坚持在“一国两制”框架下，集中力量发展经济，通过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培育好经济发展新动力。

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城市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纪纬纹通过竞争力评价发现香港的短板在于创新科技与对外联系。香港目前在功能和定位上仍有不足，未来需采取主动积极的策略，在科研、教育等领域深化与珠三角的关系。同时，进一步加大创新要素的投入力度，巩固香港的现有优势，保持香港的高度竞争力。暨南大学经济学院特区港澳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谢宝剑则具体分析了香港科技创新发展的劣势，包括科技创新产业规模较小、研发投入不足且效果不佳、科技创新企业融资困难、吸引人才力度不够、知识产权商业化率低等。

二、香港发展的定位与角色

香港回归 20 年来，国内外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香港自身的定位与角色也随外部环境的转变而不断调整。“一带一路”涉及沿线 64 个国家和地区，香港在商业、金融、法律等方面的软硬件实力突出，是“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城市。在当今世界经济增长总体乏力，内地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大背景之下，香港的定位与角色同样需要适时调整与转变。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鹏飞在“香港：一带一路的支点与枢纽”主题报告中指出，“一带一路”需要若干支点和枢纽的支撑，而香港拥有成为支点和枢纽的优势与条件，包括其区位优势、软件环境优势、城市功能优势、硬件环境优势等。香港应当构建全球商业都会，以支撑“一带一路”建设。他认为在未来欧亚非一体化和中心化的大趋势下，香港应转变此前亚洲都会的定位，面向全世界打造全球商业都会。在提升香港的功能定位方面，将香港定位为“一带一路”的金融中心、管理中心、贸易中心和交流中心。在优化香港的全球战略布局方面，香港可以把部分投资从内地向东南亚、印度和非洲转移，进一步扩大贸易覆盖范围，为参与“一带一路”的企业服务，并充分释放“一国两制”的潜力，配合国家“一带一路”建设。

“一带一路”倡议旨在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香港作为其中特殊的独立经济体，借助自身的软硬件优势，具有在“一带一路”体系中开辟新的发展路径的基础与潜力。中国银行（香港）经济及政策研究主管谢国樑在“香港在国家发展中的功能与定位”主题报告中指出，香港在国家新时期发展中可发挥四大功能，包括“一

带一路”金融服务枢纽、企业“走出去”的西式平台、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沿阵地与助推器、粤港澳大湾区国际化建设领头羊等。他认为，香港作为“一带一路”金融服务枢纽，可以为“一带一路”的项目投资提供国际化、多元化的融资渠道，发挥作为人民币离岸中心的作用，同时承担“一带一路”法律服务及仲裁调解中心的角色。此外，还可以利用香港有利的区位优势、独立及较为完善的司法制度、发达的金融服务及集资功能、廉洁高效的政府管制、简单及较低的税制等优势，建设企业运营平台。

凭借自身特殊的地理位置，香港自回归以来就是辅助内地对外联系的重要窗口，香港致远文化服务有限公司总监、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陈少波认为，香港的战略地位正从西化窗口逐步转变为“东化”平台。过去香港是西方资本、技术、人才、制度进入内地的窗口，为内地企业提供了融资平台，加速了内地现代化进程。但香港近年来新的经济增长点缺失、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导致其西化能力减弱。2014年后内地资本实现净输出，对外发展模式由“引进来”转变为“走出去”。因此，香港的战略定位应适时转变为“东化”中介。香港可为内地打开国际市场，从人才流、资本流、信息流等角度提供系统服务，推动内地债券市场、培训市场等领域的发展。

在“一国两制”的基本国策下，香港依托祖国、面向世界，不断塑造自身的现代风貌，“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功。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深圳培训调研中心教授靳环宇指出，“一国两制”与“一带一路”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双子战略，在过往的实践中形成双梯度输入和双梯度输出的实践模式。“一国两制”政策背景下，世界资源先向香港集聚，再以香港为跳板向内地辐射。而在“一带一路”建设框架下，内地的资本和技术等要素进入反哺地位。“一带一路”以香港作为中间环节，内地的优质要素反哺香港，通过香港进行沉淀、磨合、融合之后走向世界。两种模式并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渗透和促进的关系，通过这一过程实现内地、香港和世界的三赢局面。而这一过程中，香港对于其自身角色的认知和参与显得极为关键。

香港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地理系教授赵晓斌和博士生何丽莎认为，“一国两制”是香港维持自身独特性，不被其他中国城市取代的基础。在“一国两制”基本国策下，香港是内地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之间联系的重要桥梁，同时也是亚太地区重要的商业和贸易服务中心。因此，香港的核心竞争力以及较之其他城市的差异性均是基于“一国两制”而产生的。相比起内地以及其他亚洲城市，香港能在服务全球经济过程中成为与纽约、伦敦媲美的都市，很大程度上也是得益于“一国两制”基本国策。

香港不仅是世界重要的商业、金融、法律中心，也是著名的世界旅游休闲中心。暨南大学特区港澳经济研究所教授陈章喜对香港作为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竞争力进行了评价与分析，认为未来香港应提升旅游休闲国际化程度，充分利用国家“一带一路”倡议所带来的机遇，完善旅游休闲基础设施，大力吸引国际游客，扩大旅游休闲市场规模，拓展旅游休闲空间，进一步开发旅游休闲资源，构筑多元化的旅游休闲资源，发挥香港休闲娱乐文化旅游的优势地位。

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杨英认为，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应该具有“双层性”特征，香港的“世界性”应高于“内地性”。即香港首先应该是将自身发展成一个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具较强竞争力的“国际性多功能经济中心”，才有可能发展成为“内地对外联系的超级联系人”。

三、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建设与发展

我国当下的经济转型迫切需要创新型发展模式，纵观世界经济格局，湾区经济形态已经成为

全球经济重要增长极与技术变革领头羊，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建设与发展应运而生。粤港澳大湾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四个核心城市”的格局是其显著特点，同时也是其最大的难点，如何实现“深度融合”是粤港澳大湾区面临的巨大挑战。

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港澳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袁持平教授认为粤港澳大湾区是三个不同的“关税区”，面临资源整合问题，尤其是“三流”（人流、物流、资金流）顺畅问题。三地的两种不同制度各有优势，内地在政策实行上有优势，而市场经济成熟的香港、澳门则在营商规则、法制化方面有优势。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应着力发挥各自优势，克服各自短板，实现“三流”的顺畅。CEPA（《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从制度层面厘清了粤港澳大湾区从商品贸易到服务贸易中的资源整合问题，但仍然存在制度磨合问题。未来可充分利用负面清单，在自贸区的某些核心区试点引进香港的或者与国际规则完全一致的商事规则，并在交界地区打造科技创新和产业的结合地。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刘伟认为粤港合作很多年以来成果并不如预期，主要原因在于粤港合作的突破点不够明确，区域一体化进程中香港与内地不在一个话语体系内，内地产业自成体系，转移合作的重点不清晰。香港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副教授张赞贤提出，粤港澳大湾区的规划不仅要推动政策共识，通过区域规划推动“错位发展”，更要着重制定实现政策的手段和工具，并制定更长远和恒定的规划。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应通过不同方法提高利益相关者参与度，建立区域空间、社会经济信息发展的信息平台，以提高政策研究和讨论的透明度，平衡湾区内经济发展、基本建设、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等要求。

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亦需围绕经贸、科教、金融、旅游和区域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寻找合作着力点和突破口，才能推动大湾区内各城市的合作取得实在的成效。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杨再高认为，香港通过强化枢纽功能，加强区域互联互通，方能携手共建粤港澳大湾区。香港可发挥独特优势作用，积极参与和助力“一带一路”建设，打造六大战略枢纽，即投资融资枢纽、贸易旅游枢纽、交通物流枢纽、专业服务枢纽、开放合作枢纽、文化人文枢纽。暨南大学经济学院特区港澳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鹏认为，基于粤港澳在营商环境、高端智库和金融聚集三个方面的突出优势，三地可以联合打造具有引导、善后和退场机制的企业创业试验田，促进国际人才合作的人才培育试验田和推进资本市场互联互通的金融改革试验田。广东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教授级高级规划师李建平认为，未来香港应充分利用珠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的良好条件融入区域当中，共同承担国家赋予的新角色。通过加强与珠三角及内地的互联互通、积极参与广深科技创新走廊的发展建设，发挥香港服务区域的“双通道”和“超级联系人”的作用，助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共同建设一个区域一体、特色鲜明、具有世界级品质的大湾区。

四、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产业合作

服务经济是香港经济结构中的重要支撑部分，“一带一路”倡议也为香港的服务经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暨南大学经济学院特区港澳经济研究所所长钟韵在“‘一带一路’倡议下香港服务业的发展机遇与策略”主题发言中，认为国家层级的多项战略均为香港带来了新机遇，“一带一路”倡议有利于香港进一步发挥其国际化的金融、贸易、航运和信息中心的作用，全面服务我国新一轮的国际化进程。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战略为香港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动力，为提升香港全球城市功能提供了平台，为香港加强与广东的合作提供了制度创新机遇。香港

回归以来粤港服务业合作不断推进,经历了CEPA、先行先试、服务贸易自由化等阶段的变化,总体趋势呈现出服务业合作的深化、合作制度所设定的合作对接平台不断具体化;根据合作中所面临的阻碍以及经济发展的需要,合作的制度框架不断动态更新,促进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意图在制度框架演进中得以不断强化等特征。她基于由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和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构建的计量模型进行分析,认为香港应实施高增值化的产业转型升级发展战略,香港的金融业、航运业、贸易业、科技创新产业等重点行业都需实行高增值化策略。

上海大学管理学院教授赵炎对“一带一路”背景下香港与其他城市的创新地位与合作空间进行了探讨,认为应充分发挥深圳前海、广州南沙等开放合作区的作用,进一步深化与港澳的合作,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发挥海外侨胞以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独特优势,积极参与和助力“一带一路”建设,通过加强香港作为内地对外投资平台的作用,利用跨境基建工程、产业转移项目、贸易升级过程等机遇,促使香港顺利切入“一带一路”政策当中。

暨南大学国际商学院教授杨少华认为,在大湾区建设背景下,香港与大湾区其他城市的产业合作可通过六大路径开展:一是把握湾区规划机遇,实现香港高增值服务业与湾区高技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产业整合;二是配合湾区战略,推动支柱产业转型升级;三是推动湾区企业与香港企业联合“走出去”,共同参与湾区建设;四是引进香港金融机构跨境拓展业务和建设金融后台服务基地;五是开展香港科创中心建设,争取成为湾区高端服务业的集聚地;六是给予香港一定的优惠政策,在湾区内打造“香港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在政治、经济、法律,乃至宗教、文化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这些差异之处可能会导致商业发展及投资过程中的不确定因素,引发大量的商业纠纷及法律问题。香港树仁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区志坚和“一带一路”国际研究院副主席、博爱医院副主席李鋆发认为香港可利用自身优势,成为“一带一路”商业法律纠纷问题上由起诉至调节的平台。香港具备大量高素质法律人才,未来不应只是一个法律诉讼中心,应进一步向国际商贸纠纷的仲裁中心发展。

五、香港发展的历史、文化与政治

香港发展的历史曲折,形成了特殊的地域文化,并拥有特色文化传统与大量的特色活动。香港树仁大学质性社会研究中心研究员李秀国教授以“长洲抢包山”和“香港书展”两个案例,从人类学视角对文化与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香港地方认同构建、传统文化节庆的保育活化与开发、香港书展中的政治经济学意蕴等方面进行了探讨,认为香港书展和长洲包山节的实践,已经不单单限于书展本身、限于一个节日的保存,其保育与开发的涵盖面已经被充分地扩大、延伸。他们都注重地方历史、社区文化和集体记忆,也注重社区环境的保育。文化复兴和保育的参与者不再如过往印象那般限于专家学者和政府官员、平民百姓、当地组织、私人企业等,甚至一般游人,都能参与其中。

近年来,如何增强港人的民族认同感、民族自豪感,构建港人的身份认同等问题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深圳大学社会科学学院讲师、特聘研究员辉明认为,香港人“身份认同”的构建可借鉴新加坡的成功经验。在坚持“一国两制”方针的基础下,根据香港实际情况,审慎对待本土意识,从改革国民教育、解决香港的经济问题和加快香港同内地经济合作三个方面着手,在承认双重认同与文化多元的基础上建构一元的国民身份认同,以促进港人在民族、文化和国家意义上的

“人心”全面回归。辉明认为构建港人国民身份认同的关键应是在解决香港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在推进香港与内地的经济合作的基础上，承认双重认同与文化多元，从而建构一元政治意识，即国家意识。

香港浸会大学体育学系教授刘永松教授提出，自香港回归以来，香港与内地的体育运动交流日益紧密，内地对香港体育的影响深远。奥运金牌运动员访港活动提高了香港的民族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未来香港可承担平台功能，促使内地与国际社会在体育发展方面的交流，协助国家在国际体坛上的进一步发展。

结 语

回归 20 年来，“一国两制”伟大构想在香港成功实践，香港在各领域均取得了空前的发展成就。正如研讨会开幕式上，国务院港澳办港澳研究所副所长何德龙在致辞中所指出的，香港回归 20 年来，不仅仍然是内地最大的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地和内地企业最大的境外融资中心，还逐渐成为人民币国际化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战略平台。香港作为我国具有独特地位和功能和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其内外发展因素和环境必将在“一带一路”新格局下得到重塑。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构想的提出，对珠三角城市群加快区域整合，优化资源配置，构建新的发展平台亦将具有十分深远的影响。对于香港而言，如何抓住“一带一路”和大湾区建设的历史性机遇，创新合作模式，明确功能定位，实现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培育新的增长点，都亟待深入研究，并在未来很长时间内都将成为国内外专家学者共同努力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

作者简介：程玉鸿，暨南大学经济学院特区港澳经济研究所副教授；朱颖，暨南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生。广州 5106322

[责任编辑 孟书强]

Keywords: Hong Kong; 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laissez-faire capitalism; the Belt and Road;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Does CEPA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s Service Industry?

..... *Qin Chenglin & Jiang Haojie (75)*

Summary: The service industry which is heavily affected by CEPA is the pillar industry of Hong Kong. The issue whether CEPA has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ervice industry is controversial.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mpact of CEPA on Hong Kong's service industry through factual investigation and econometric analysis. The result shows that CEPA has improved the degree of liberalisation of Hong Kong's service industry accessing into the Mainland and promoted the service trade between Hong Kong and the Mainland, which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s service industry. However, affected by many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the promotion effect is not stable all the time. More specifically, it first increases then decreases with time going by. At present, Hong Kong should seize opportunities from national policies including CEPA,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and "the Belt and Road". It is necessary to promote the two-way opening with the Mainland. At the same time, strengthening the cooperation and integration with the Mainland is also important. Only by making these efforts, can Hong Kong take more advantages of CEPA and enhance the development of service industry.

Keywords: Hong Kong; CEPA; service industry; the Belt and Road;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Reviews of Symposium of Innovation and Cooperation: Functional Orientation and Development Transformation of Hong Kong unde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 *Cheng Yuhong & Zhu Ying (86)*

Summary: This paper sorts out and summarises the main ideas of the Symposium of Innovation and Cooperation: Functional Orientation and Development Transformation of Hong Kong unde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Celebration of the 20th Anniversary of Hong Kong's Return to the Motherland. The experts and scholars discussed different topics of Hong Kong's developmen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ncluding opportunities, challenges, motivation, orientation and role of the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industrial cooperation within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and so on. This symposium has brought together the latest thinking and views of Hong Kong and mainland scholars o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

Keywords: Hong Kong; the Belt and Road;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